



印度对华认知变化与谨慎平衡政策 ——基于《不结盟 2.0》报告的解读

吴 琳

[摘要] 以 2012 年发表的《不结盟 2.0》报告为重要标志,印度精英和政府积极酝酿对华认知变化和政策调整。2013 年以来,印度“谨慎平衡”中国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张的倾向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在应对边界危机、发展政治关系和推进“东向战略”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维持合作与竞争、秩序与实力的动态平衡。莫迪政府上台后,不会大幅调整目前推行的谨慎平衡政策,但将增加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力度,外交上更为主动和活跃,这对于中国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应提升印度在周边外交布局中的地位,在缩小彼此诉求差距的同时,加强多层次政策协调与合作。

[关键词] 印度对华认知;谨慎平衡;不结盟 2.0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4)05-0041-45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4.05.007

一直以来,印度秉持坚定的现实主义原则,视中国为潜在的战略对手和有限的合作对象,将防范中国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轴。^[1]2010 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包括美国、印度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开始发生程度不一的改变。^[2]面对中国实力的快速崛起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PR)于 2012 年 2 月发表了题为《不结盟 2.0:印度 21 世纪外交和战略政策》(以下简称《“不结盟 2.0”》)的报告。以此为标志,印度政府积极酝酿对外战略反思和对华政策调整。本文基于对《不结盟 2.0》报告的解读,考察 2013 年以来印度在应对边界危机、发展政治关系和推进“东向战略”过程中的对华认知变化和政策调整,并对印度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和中国应对做出评判和建议。

一、《不结盟 2.0》报告与印度对华认知变化

印度政府对《不结盟 2.0》报告非常重视,不仅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军事顾问的普拉卡什·梅农(Lt. Gen Prakash Menon)、前外交秘书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主席、世界事务研究所主任等参与了该报告的撰写,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和两位副手也参与了他们的讨论,多位政府高官还出席了报告发布会,报告一经发表,引起印度国内外巨大反响,被视为印度精英战略思维更新

和对华认知变化的重要标志,由此引发的广泛讨论也为印度外交战略反思和对华政策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

报告开篇就提出了对外战略反思的重要背景和核心问题,即面对总体有利于印度发展的国际环境,以及未来 10 到 15 年发展成为繁荣国家的重要机遇期,印度应采取什么样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以更好地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和政治民主。^[3]印度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报告并不期望确立某种全新的具体政策,而是试图就印度融入国际社会的方式达成基本的国内共识。^[4]基于以上判断和考虑,报告提出“不结盟 2.0”作为印度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本原则,将对未来十年的印度外交战略产生指导性作用。^[5]所谓“不结盟 2.0”,是指根据变化的国际环境,对自独立以来印度处理国际关系所奉行的“不结盟”原则进行更新和再解读。随着印度经济增长对外依赖性的增强,国家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全球权力分散和多中心的出现,“不结盟 2.0”必须抛弃抽象的理想主义,不再局限于“避免成为超级大国冲突的前沿国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广泛的政策框架。明确国家利益或对外交往方式的界定不受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确保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以及加强国家实力以建构更为公平正义的全球秩序,将是“不结盟 2.0”的核心目标。^[6]

基于印度对外战略反思和对不结盟原则的全新解读,报告在“中国篇”重点阐述了对中国的定位和期待,以及对中印关系

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发展前景的预期和展望。首先,报告将中国因素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是未来印度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7]中印关系已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全局性意义,因此,应以推动实现新不结盟原则的三大核心目标为出发点,制定务实有效的对华政策。

其次,报告延续了印度一贯以来对中国的基本定位,即视中国为印度的威胁或挑战。^[8]报告开篇就提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印度外交政策和安全的巨大挑战。作为一个主要大国,中国直接冲撞印度的地缘政治空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强,中印实力差距将会扩大。”^[9]基于不平衡的对华心态,报告对中印关系中边界争端、大国关系、贸易不平衡等问题的看法总体趋向消极。这表明印度对华认知的基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再次,作为新形势下印度政府及其国内精英对华认知变化的主要体现,报告在对华战略思维和手段上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思想。报告对甚嚣尘上的“联美制华”战略予以否定,认为出于平衡中国的战略需求,印美应加强战略合作,但与美国结成制华联盟,充当美国在亚洲反制中国的“马前卒”,将会损害印度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加剧地区局势动荡。对华实行“两面下注”,一方面利用地区国家平衡中国的杠杆作用,加强印度与它们的战略互动,增强印度的地区影响力,缩小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稳定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扩大与中国的政策协调与合作,解决两国共同关心的发展和安全问题,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印度国家利益。为此,报告建议,“印度对华战略必须维持谨慎平衡,即合作与竞争的平衡,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平衡,双边与地区的平衡。鉴于中印两国目前和将来实力和影响力的不对称性,印度必须把握好这一平衡,这或许是未来印度战略最为重要的挑战。”^[10]

由此可见,印度国内精英的对华认知正逐渐趋于全面、长远和理性。对两国实力不对称的消极认知不再是他们对华政策选择的逻辑起点,而是开始尝试从构建双边制度框架和重塑国际秩序的观念出发,为中印关系创造新的利益共同点和合作增长点,减轻或抵消因实力对比差距拉大给双边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内精英的对华认知变化推动了印度政府对华政策调整。2013年以前,尽管中印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畴开展了多领域多渠道的对话与合作,但防范中国作为印度对华政策的主轴,始终主导着印度的外交实践和双边互动。进入2013年以来,为因应中国实力上升和美国亚太再平衡带来的中美博弈加剧和亚太变局,印度政府在防范中国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华战略平衡的力度,表现为在应对边界危机、发展政治关系和推进“东向战略”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合作与竞争、秩序与实力之间的谨慎平衡。

二、应对边界危机:制度管控与战略优势的谨慎平衡

冷战时期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界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11]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结束至今,两国基本维持了边界和平与稳定,但近年来形势发生了新变

化。双方在边境地区修筑公路等军事基础设施,改善和提升边防部队装备,导致双方巡逻队在边境前线相遇的机会较之以往大为增加。加之印度私营电视和中国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两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边境事务越来越频繁地展现在大众视野中,使得实控线两侧军方的回旋余地较之前有所缩小。2008年夏天,两国在边境东部锡金段“指尖地区”(Finger Area)发生了“人链对峙”,2013年5月又在边境西段拉达克东部地区发生了“帐篷对峙”。危机之下,中印两国都意识到加强边境地区管控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构建和完善管控机制的紧迫性。

2013年10月,在辛格总理访华期间,边界问题出现重要转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和印度国防秘书马瑟(R. K. Mathur)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边防合作协议》,为推进边境管控合作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有利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宁。解读这份协议可以发现,印度对于制度管控边境危机态度积极,两国就密切合作达成了很多重要共识,包括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挑衅行动和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导致重大危机的发生;加强信息交换,联合打击边境地区的武器、野生生物等走私活动;保持边境人员、军方、国防、外交等多层次沟通机制;举办多样化活动,增强边防部队相互了解和合作等。^[12]然而,在实际控制线的划定和边境地区的前沿部署等关键性问题上,分歧仍显著存在。

尽管印度积极构建边界危机的管控机制,但其核心关切仍是目前的边境地区现状。印方认为中方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早于和优于印方,为扭转实力对比的劣势地位,印方必须寻求改变现状。因此,在协议谈判中,印方尤为强调“相互且同等安全原则”(principle of mutual and equal security)的重要性,^[13]认为中印在边境地区的情况和条件存在很大差异,不能用同一标准对双方的军力部署、设施建设等进行相同限制。从表面上看,印度的主张是为维持双方力量均势和边境地区稳定,其实质则是为了提升印度在边境地区的战略能力,确保己方在战略博弈中获取相对优势。在目前的边界形势下,对实力对比优势地位的追求是印度应对边界危机的首要目标,推动制度管控合作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印方在制度管控与战略优势之间寻求平衡的做法决定了《边防合作协议》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未来印度还将继续加强边境地区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边境地区实力对比现状,为引发新的纠纷和对峙埋下了隐患。

三、发展政治关系:利益分享与诉求错位的谨慎平衡

中印两国于2005年确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长期以来,两国间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贸易不平衡、领土争端、军事互信、巴基斯坦问题等问题长期存在,制约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政治关系,推动各领域全面深入的务实合作,双方于2013年取得了边界问题的重要突破,实现了两国总理的年内互访,还发表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为搭建中印战略合作

新框架创造了政治和制度条件。在两国高层政治互动不断加强的过程中,辛格政府一方面体现出对构建未来双边政治秩序的重视,强调责任分担和利益分享对于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受制于利益分歧和诉求错位等消极因素的影响,与中国在个别问题上竞争态势不减。为将分歧和竞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影响双方合作大局,印度的战略选择是在利益分享与诉求错位之间寻求谨慎的动态平衡。

利益分享是国家间政治关系维护和巩固的基石。基于两国在国家发展、地区合作和全球秩序上的共同利益和相互责任的认知,印度政府积极推动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的利益分享机制。首先,在“发展是首要”的共识基础上密切务实合作。两国在 2013 年 5 月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多年来,中印探索出一种行之有效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模式,成为相邻大国之间关系的典范。”“中印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两国的发展将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双方欢迎对方的和平发展,认为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世界也需要中印实现共同发展。”^[14] 辛格总理还公开表示,中印关系对于两国和平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对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而言也意义重大。^[15] 可见,两国在共同发展方面已达成了基本的战略共识。基于共同的政治承诺,两国积极开展跨境河流管理、和平发展核能等发展领域的沟通与对话,未来将为维护喜马拉雅生态系统和保障本国能源发展与安全加强协作,并履行各自的国际义务。

其次,在地区事务中加强多边协调。近年来,随着印度“东向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印日益加深的地区互动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发展新的亮点和增长点。以东亚峰会、上合组织、南盟、亚欧会议等多边机制为主要依托,两国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能源安全、人文社会等领域逐步建立起地区层面的利益分享机制,不仅加深了两国在地区共同物品提供上的责任分担意识,凸显了地区性大国的示范性作用,也是对两国双边利益分享机制的必要补充。

再次,共同塑造全球多极秩序。中印在全球秩序改革、气候变化、能源和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立场一致,^[16] 为两国共同塑造全球多极秩序、维护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奠定了利益基础。借助金砖组织、G20、联合国等主要机制平台,中印两国在制度重塑、议程设置、利益分配、合作方式等方面加强了利益协调与相互配合,初步形成了双方在全球层面的利益分享机制。在全球化深刻影响国际关系事务的时代,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利益分享机制相互促进、彼此强化,已然成为印度巩固和深化对华政治关系的主要动力基础。

然而,在努力构建中印利益和责任共同体的同时,印度也对双方政治关系发展的局限性及其内在根源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目前中印关系的总体定位,印度前外长库尔希德曾直言,中印可以成为战略伙伴或朋友,但目前两国是“良好的工作关系”(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还有很多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17] 换言之,中印政治关系发展现实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愿景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双方诉

求错位带来的互信不足。对印度而言,其对华需求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承认印度世界大国地位的渴望,对长期支持巴基斯坦立场的放弃,以及在领土问题上接受“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的现实等;并且要求中国的承诺清晰而明确,不存在模糊空间,一旦作出承诺即不可变更或撤销,进而直接显著地增加印度的不可逆收益。而对中国而言,印度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并不如中国之于印度的重要性高,因而,在对印需求上显得利益目标不清晰,要求对方做出不具约束力的外交表态往往成为中国解决分歧和化解矛盾的主要方式。^[18] 中印在相互诉求上的严重错位导致两国无法充分理解和满足对方的需要,政治互信缺失,双方战略合作新框架的更新和重塑面临严峻考验。正是基于对两国政治关系局限性的清醒认知,印度政府在积极推动利益分享机制的同时,明确表达和宣示自我诉求,在合作与竞争、双边秩序构建与诉求错位现实间寻求平衡。

四、推进“东向战略”:亚太均衡与地缘战略的谨慎平衡

印度“东向战略”始于 1991 年上台的拉奥政府,其初衷主要是为了拓展印度的经济发展空间。^[19] 该政策延续至今,无论是在地域范围、合作内容,还是合作方式上,都有了延伸和拓展。印度积极推进“东向战略”不仅导致了中印利益交织程度的加深,也为双方加强对话与交流、协调与合作、竞争与博弈创造了地区互动平台。面对中美相互竞争的东亚二元格局,在亚太均衡与地缘战略间寻求平衡日益成为印度因应中国快速崛起和地区变局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印度大力推进“东向战略”,既有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也融入了自身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均衡地区秩序观。一方面,印度支持美国通过强化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在亚洲加强军事部署,积极介入亚洲事务,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印度也对由此带来的秩序失衡和局势动荡深感担忧。为了在制衡中国力量扩张的同时,确保印度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自主性和在地区秩序中的独特地位,印度主张通过构筑包容开放多元的东亚地区机制,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的务实合作,维持各大国势力均衡,塑造亚洲新秩序。

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的选择为例。美国主张通过强力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进程推动亚太自由贸易格局的“跨洋”框架,^[20] 稀释中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核心作用。对于美国制华的这一经济举措,印度并未选择与其站在一起,相反,印度与中国一道大力支持在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框架下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类似情况还出现在东亚峰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上。自美国于 2011 年加入东亚峰会以来,各大国关于东亚峰会的性质定位和合作方向争论不断。美国试图改变东亚峰会作为战略论坛的一贯定位,主张将东亚峰会建成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首要架构,^[21] 将南海、东海等问题国际化,进一步压制中国的外交活动空间。对此印度并不认同,主张将焦点放在 RCEP 谈判进程,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医疗卫生、教育等发展议题的务实合作,以及灾害

管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经验分享与协作上。对于中国提出的“金边发展倡议”，辛格政府也积极响应，最终促成了《东亚峰会金边发展宣言》的签署和发表。由此可见，在东亚目前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秩序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下，印度并不寻求跟随美国、制衡中国的简单策略，而是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地区因素，开展与中国的有限合作，进而达到平衡美中地区势力、塑造亚太均衡秩序的目的。事实证明，印度不仅从在与中国的多边协调中获取了收益，而且有效地在美中竞争态势中凸显了印度的独特地位。

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地缘安全格局中，印度则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选择。区别于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秩序的积极维护，印度倾向于借重与美、日、越等国的战略互动，拓展地缘战略利益，发挥制约中国的杠杆作用。为牵制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张”，拓展印度海洋地缘利益，确保东亚地区海上通道安全，印度在深化经济合作的同时越来越注重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发展海上安全合作。基于 2006 年签署的“海事合作框架”（MCF），印美加强了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海上联合行动，在联合军演、军备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也日益紧密。印日海上安全合作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12 年以来，两国在日本附近海域和印度洋海域举行了两次双边海上联合军演，并已确定将每年举行双边海军演习。在 2013 年 5 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期间，两国领导人还就在中国南海地区附近开展联合演习达成了共识，辛格还邀请日本自卫队参加 2014 年的“马拉巴”（Malabar）海军作战演习，^[22]打破了此前印方一直坚持的在印美两国间进行的惯例。在军购方面，印日合作也日益紧密。随着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深化，今后印度全部港口将可能向日本舰艇开放，从而实现地缘和军事资源的共享。除此之外，印度还同越南等国增强了南海争议海域的能源开发、安全协作等战略互动，使中国地缘安全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

五、结语

近年来，中国因素在印度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印度在反思外交战略的同时，对对华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制定了在合作与竞争、秩序与实力之间维持谨慎平衡的新政策。

进入 2014 年，印度国内政局变动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给印度对华政策走向增添了新的变数。在印度国内，纳伦德拉·莫迪当选新一届政府总理，上任之初，他就表现出务实、积极、主动的外交风格。^[23]与此同时，美国继续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亚洲盟友和地区大国对中国的牵制作用，对印度新政府在平衡中国力量方面寄予期望。尽管国内政局变化和国内因素可能会给印度对华政策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但由于中印关系的大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未来印度不会大幅调整目前推行的谨慎平衡政策，但将增加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力度，外交上更为主动和活跃，这对于中国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

面对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中国应显著提升印度在周边外

交布局中的地位，加强对印认知和应对能力。一方面深刻理解和理性看待印度复杂的大国心态和因实力不对称导致的对华不平衡心理，明确对印诉求，在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对方的利益，缩小彼此诉求差距，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另一方面对印度加强与美、日等国的战略合作以及推进“东向战略”的发展态势保持足够清醒认识，同时积极强化与印度在边界问题、政治关系、地区合作等主要议题的战略共识，推动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注释]

- [1] See Amitabh Mattoo, “Imaging China”, in Kanti Bajpai and Amitabh Mattoo, eds., *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2000, pp. 13-25.
- [2] 金灿荣、段皓文：《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境与出路》[J]，《国际观察》2014 年第 1 期，第 72 页。
- [3] [4] [5] [6] [9] [10]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 7, p. III, p. 8-9, p. 1, p. 15, http://www.cprindia.org/sites/default/files/NonAlignment%202.0_1.pdf, 访问日期：2014 年 3 月 21 日。
- [7] 事实上，将中国置于优先重要的地位已在印度政府现实的政治表态和政策实践中有所体现。See “Manmohan Singh tells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China occupies ‘high priority’ for India”, <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manmohan-singh-tells-president-xi-jinping-that-china-occupies-high-priority-for-india-1907717>, 访问日期：2014 年 3 月 21 日。
- [8] 印度对华主流认知将中国视为威胁，但在是否构成现实威胁上存在分歧。务实派倾向于将中国视为潜在的长期威胁或挑战，认为两国存在竞争，但可以通过发展经济关系和以国际体系主要大国的身份制衡中国来管控可能出现的冲突。强硬派则将中国视为短期和长期的战略对手。See Harsh V. Pant,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0, No. 4, Oct.-Dec. 2006, pp. 771-772; Steven A. Hoffman, “Perception and China Policy in India”, in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4, pp. 40-49.
- [11] 宋德星：《21 世纪的中印关系：印度的根本战略关切及其逻辑起点》[J]，《南亚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4 页。
- [12] [13]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Border Defence Cooperation”, October 23, 2013, <http://www.mea.gov.in/in-focus-article.htm?22366/Agreement+between+the+Government+of+the+Republic+of+India+and+the>

- +Governmen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Border+Defence+Cooperation, 访问日期: 2014 年 3 月 20 日。
- [14]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 印度新德里, 2013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zygx/zywx/t1041929.htm>, 访问日期: 2014 年 3 月 25 日。
- [15]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Media Statements by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and Chinese Premier in New Delhi”, May 20, 2013, <http://www.mea.gov.in/incoming-visit-detail.htm?21728/Media+Statements+by+Prime+Minister+of+India+and+Chinese++in+New+Delhi>, 访问日期: 2014 年 3 月 20 日。
- [17] P. S. Suryanarayana, “ISAS Interview with India’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South Asia*, Issue No. 19B, December 2013, <http://www.mea.gov.in/outgoing-visit-info.htm?2/645/External+Affairs+Ministers+visit+to+Singapore+October+2324+2013>, 访问日期: 2014 年 3 月 15 日。
- [18] 参见叶海林:《合作、协调、竞争与冲突并存: 21 世纪的中印关系》[J], 《国家人文历史》2013 年第 20 期, 第 41—42 页。
- [19]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Annual Report 2009-2010,” p. 136, <http://mea.gov.in/mystart.php?id=500415660>, 访问日期: 2011 年 11 月 20 日。
- [20] 竺彩华:《东亚经济一体化: TPP 还是 RCEP ?》, 载魏玲主编:《东亚地区合作: 2012》[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52—278 页。
- [2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Honolulu, 12 January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 访问日期: 2013 年 4 月 14 日。
- [22] “马拉巴”演习是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年度双边海军联合演习。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occasion of Official Visit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to India”, New Delhi, January 25, 2014, <http://www.mea.gov.in/incoming-visit-detail.htm?22772/Joint+Statement+on+the+occasion+of+Official+Visit+of+the+Prime+Minister+of+Japan+to+India+January+2527+2014>, 访问日期: 2014 年 3 月 22 日。
- [23] 莫迪上任后的外交动作印证了其在竞选纲领中所宣扬的, “我们将凭自己的实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周边外交及其他事务, 而不是被别的大国势力所领导。”“一个复兴的印度必须在国际社会获得合适的位置。”See Sabka Saath and Sabka Vikas, “BJP Election Manifesto 2014,” p. 40, <http://bjpelectionmanifesto.com/pdf/manifesto2014.pdf>, 访问日期: 2014 年 5 月 1 日。

作者简介: 吴琳,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北京, 100037)

收稿日期: 2014-06-08

修改日期: 2014-07-15

crucial role in power aggrandizement.

Theoretical Probes

29 From Community Method to Union Metho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Governance

by Zhu Guichang

Community method featured with its supranationality has been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s and has been questioned from all sides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since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However, Union method with the emphasis on coordinated action by the member states has been strengthened in the process of addressing the crisis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major mode of strengthening Eurozone governance and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governance. 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community method to the new union method has taken place in times of crisis, it is not a temporary move and it signifies the new tend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governanc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35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Protec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by Chen jimin

With the expansion of overseas interests,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se interest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n terms of safeguarding overseas interests, China has made many efforts, such as build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signing overseas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s, improving consular protection institution and participating i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These measures are conducive to protecting overseas investment interes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But meanwhile, it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tect overseas investment. Furthe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on enhancing six kinds of capabilities, namely the abilities of integrating diplomatic resources, improving agency coordination,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environment building, enhancing emergency response, raising the ability of military action and reinforcing the ability of image-building. On this basi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 path of overseas investment prote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1 India's Perception Change and Careful Balancing Strategy toward China: Based on the Important Report Titled 'Nonalignment 2.0'

by Wu Lin

Marked by an important report titled "Nonalignment 2.0" published in 2012, Indian elites and government began to change their perceptions and policy toward China. Since 2013, in response to China's rapid rising, India has started to strike a careful balan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order and strength, in handling border crisis,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look east strategy'. India's new government would not make a substantial adjustment to its China strategy, but may increase involvement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become more active diplomatically, which means both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China. Therefore, China should enhance India's position in it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narrow the gap between each other's demands, and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t multiple levels.

World Economy

46 Influence of TP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egotiation on Chin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by Cong Lixian

TP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egotiation is one of the ho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PP IPR negotiation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the text for negotiation is rich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embracing, Americanization and well ahead of time. The rules of TP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ve mutual inheritanc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with TRIPS and ACTA. It will have important impact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or the TPP IPR negotiation, we should adopt an open attitude, mak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ules, stud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